



绿天 雪林

沈 晖 编选

我对世间万事一无所好，所爱只是读书。若有一个神仙以三个愿望许人选择，我所选择的第一愿，要有一个完备的图书馆，让我终日徜徉其中；第二愿，有一个和美的家庭；第三愿，太平时代的中产之家的收入。倘神仙所许的仅一愿，那么，给我图书馆吧。

我的性格外表上好像欢喜热闹和活动，内心实倾向孤独，所爱的是从容的岁月和恬静的生涯。

漫 忆 女 作 家 丛 书



绿天 雪林

沈 晖 编 选

我对世间万事一无所好，所爱只是读书。若有一个神仙以三个愿望许人选择，我所选择的第一愿，要有一个完备的图书馆，让我终日徜徉其中；第二愿，有一个和美的家庭；第三愿，太平时代的中产之家的收入。倘神仙所许的仅一愿，那么，给我图书馆吧。

我的性格外表上好像欢喜热闹和活动，内心实倾向孤独，所爱的是从书和书写的生涯。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云霞出海曙， 辉映半边天

——“漫帆女作家丛书”序

陈漱渝

在中国，女性自觉投身文学创作并把自己的作品作为社会文化流通一部分的历史是短暂的。虽然历史上曾陆续出现过卓文君、班婕妤、蔡文姬、李清照一类才女写作，虽然晚清革命家秋瑾已经在她的作品中渗透了强烈的女性意识，成为由古代女性写作向现代女性写作过渡的先驱，但女性作家作为群体出现还是在狂飙突进的五四时期。在这场被喻为中国文艺复兴的新文化运动中，繁星璀璨般地出现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女作家。

她们是——“身上每一个细胞都充满着文艺气息”（胡适语）的陈衡哲，以“问题小说”作为“第一部曲”（冰心语）、其后写作生涯长达一个世纪的冰心，从“海滨故人”的小屋子门口探头一望就又缩回去了（茅盾语）的庐隐，擅以闺秀笔致写“旧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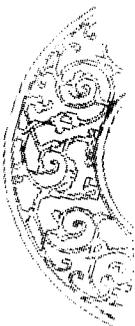
庭中婉顺的女性”(鲁迅语)的凌叔华,真实表现“五四”青年“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敢和传统战斗”(鲁迅语)的冯沅君,埋葬于陶然亭“春风青冢”下的石评梅……她们的作品表现出对妇女人权,特别是婚姻自由权、教育权、职业权的密切关注,围绕着“娜拉走后怎样”的中心命题,对中国妇女的历史命运进行深沉的探索,对传统的男权中心及其价值观念提出勇敢挑战。她们在中国女性文学的空白之页上谱写了开天辟地的篇章,彻底结束了中国女性在文学史上作为“盲点”而被遮蔽和隐埋的历史。

第二代女作家群体涌现于三、四十年代。在这批作家中,最具承前启后意义的是善写女性并始终坚持女性立场的丁玲。她不拘囿于自我遭遇和个人情感,能透过女性觉醒的表层揭示出她们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因而使其作品最具有近、现代女性的“强己”意识,也最具有面向整个社会和面对全部历史的高度责任感和强烈使命感。另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女作家是呼兰河的女儿萧红。她以一种天然的女性写作,展现出“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鲁迅语)以及更广阔的世事人心。四十年代沦陷区上海“不合时宜”地出了一位张爱玲,她那极具现代感的才华横溢的写作令她的读者隔着时代一惊再惊。此外,在第二代女作家中,至今还留在读者记忆中的还有“文儒女侠一身当”(柳亚子语)的谢冰莹,有与凌叔华并称“珞珈山三女杰”的苏雪林、袁昌英——她们集作家、学者、教授于一身,有因肩负特殊使命而蒙冤廿七载的左联女诗人关露——她就是脍炙人口的歌曲《春天里来百花香》的歌词作者,有“喝过鲁迅奶汁”的草明、陈学昭,有巴金关怀、培养过的罗淑、罗洪,有跟老舍共同创作过话剧《桃李春风》的赵清阁,有创作、翻译均结硕果并成功自办了出版社的沉樱,有以创作历史小说崭露头角而后来以填写古典诗词赢得盛誉的沈祖棻,有怀着“焦灼的渴意”进行创作的九叶

派诗人陈敬容，有因短篇小说《贵宾》含沙射影“攻击江青”而在文革时期遭到批判的葛琴……跟第一代女作家相比，第二代女作家作品的基本风格更为激越浑厚，体现了女性意识的升华和女性书写的历史进步。

从1949年至1966年的十七年中，中国女作家大多在作品中取中性化或雄性化姿态，表现出女性审美体验的失落。但即使如此，在战争、家庭一类社会性、革命性主题的掩盖下，她们的作品仍或多或少潜隐着对女性命运的关切和思考，渗透出女性情感、心态、价值观念的特殊色彩。在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历史上的一切进步文化基本上都被革除，中国年轻的女性创作当然更没有立锥之地。直到百废俱兴的八、九十年代，由于改变了“男女都一样”的生存环境，中国的女性创作才重新复苏，并很快就在题材的丰富性与体裁的多样性诸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呈现出无比广阔的历史前景。不过，也有些女作家在都市文化意识和商业化倾向的影响下迷失了自我价值，步入了创作误区。有人热衷以“小女人”心态咀嚼身边的小小悲欢，有人过分热衷于与性相关联的“身体书写”，这些倾向显然背离了中国女性写作的优良传统。

中国的女性创作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西方女权主义（或曰女性主义）的影响。其实，女权主义或女性主义都源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英文中出现的Feminism一词。这是一种谋求男女平等的意识形态和实践活动，旨在消除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诸方面歧视妇女的现象。由于女权主义的译法容易使人产生女性张扬自身霸权的误读和偏见，目前在港台及其它华人地区比较约定俗成的译法是女性主义或女性性别主义。从强调角度而言，女性主义更为关注性别差异，强调性压迫、性歧视、性的不平等给女性



带来的种种压抑。显然，中国现代出现的女作家并不都是女性主义者，她们的作品当然也不能一律划归于女性主义文学范畴。根据我的理解，女性主义文学不仅必须以女性为创作主体，不是男性作者以女性题材写出的作品；而且女性作家必须自觉以女性意识进行创作，并在作品中鲜明体现出性别立场和女性的美学情愫。“女人写”或“写女人”的文学作品并不都是女性主义文学。只有女作家以女性意识对女性的历史状况、现实处境和生活经验进行描绘，并且在艺术方法上对传统男性中心社会文化建构进行颠覆和反叛的作品，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文学。所以，中国五四时期和三、四十年代的女作家作品，大多只能称之为女性书写或女性创作，而不能用削足适履的方法统统塞进女性主义文学的靴子。

在这里更需要强调的，是中国近现代妇女运动跟西方女权运动的区别，因为这个问题跟研究中国现代女性创作（或曰女性书写）有着密切关联。自1902年同盟会成员、近代文学家马君武译介赫伯特·斯宾塞的《女权篇》开始，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就跟男性革命家和男性进步学者的倡导密不可分，取一种“常青指路”模式，而没有出现西方文化中那种泾渭分明、截然分立的性别意识，也没有形成独立的思想体系和权威性的代表人物。更由于面临着“三座大山”（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中国社会中的阶级对立和民族对立远远超过了男女性别间的对立。如果中国的妇女运动不汇入挽救国家危亡、推进民主政治的民族民主革命洪流，如果妇女不首先争得基本的生存权，就根本谈不上其它人权和女权。因此，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无法成为一种独立存在的运动。在这种波澜壮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中国的女性创作不但无法跟反映并推动民族独立和社会变革的主流文学脱节，不但无法跟人民大众的主流意识形态脱节，而且



不少卓有成就的女作家还自觉淡化性别意识，将自己独特的性别遭遇转换为对民族命运种族生存的关注，以一种“大女性精神”进行创作。丁玲拒绝为《真善美》杂志的“女作家专号”撰稿，宣布只卖稿子不卖“女”字。谢冰莹要做“女丘八”。冯铿“从不把自己当女人”（《妇女运动概论》）。白薇要做“女子汉”，用文学的武器表现被压迫者的痛苦，暴露压迫者的罪恶。杨刚在北平沦陷的日子里，处于“有男人，不能作男人的女人；有孩子，不能作孩子的母亲”的境地，决心跟蹂躏“中国皇后”的强盗拼死斗争，随时准备牺牲。曾克卸下红妆，以随军记者身份挺进大别山，先后参加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大西南战役，创作了大量史诗般的战地通讯。菡子更明确表示：“我是一个小兵，埋在我心里最宝贵的东西，是战士生活和回忆，部队是我最早的学校，伟大的革命战争赋予我艺术生命。”只要我们不把女性主义作品跟优秀文艺作品划上等号，只要我们不把女性经历局限于女性隐私、性心理、性经历，只要我们不把女性主义的批评方法视为唯一的文学批评方法，我们就能对中国现代女性创作的成败得失作出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估。

正因为中国现代女性创作为中国文学宝库增添了异彩，好比“云霞出海曙”（唐·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映红了
中国现代文学的半边天，深入研究这些女作家的生平史实和心路历程就成为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因此，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这一套“漫忆女作家丛书”既是研究中国女性创作的一项基本建设，也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项基本建设。丛书所收诸篇提供的都是作者亲历、亲闻、亲见，更增添了这套丛书的史料价值。多年来，我阅读并研究了不少回忆录作品，也曾比较系统地阐述我对回忆录写作的意见。简而言之，在我看来，对待回忆录应采取的态度是八个字：不可不看，不可尽信。“不可不看”，是因



为作为史传文学的回忆录能弥补媒体信息储存和文献资料记载的不足,进一步丰富文学史料的仓储。由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一门年轻学科,像苏雪林、谢冰莹、凌叔华这样撰写过自传或像庐隐、萧红、王莹这样撰写过自叙性作品的作家并不多,所以作家同时代人提供的回忆和评价就显得更为珍贵。“不可尽信”,是因为任何回忆录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回忆者个人立场、观点、情感和接触范围的局限,带有不同程度的主观色彩,而且从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要求记忆跟事物的本来面貌完全吻合,也是一件完全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因此,在阅读回忆录的同时必须对所提供的史料进行核实和鉴别。根据我的阅读经验,他人的回忆如果跟作者本人的自述不符,一般应以自述为准。不同回忆者对同一件事说法不一,一般应尊重多数人的说法,但也应该允许少数人保留自己的看法。同一回忆者不同时期的说法如果互相抵触,在正常的情况下,一般说来较早的回忆往往比较迟的回忆更为可靠。回忆如果跟事实不符,则应该无条件面对事实,承认事实。严格的真实性是回忆录赖以存在的基础,而夸张或掩饰的回忆录只会惑乱视听,给读者以误导。在回忆录中,存心作伪的情况也间或出现,这种赝品更值得我们警惕。

在这套丛书出版之际,丛书策划人和有些编者希望我写几句话充作序言。时值苦夏,酷热难熬,我勉力写了以上文字,以期帮助读者进一步认识中国现代女性创作的历史地位和这套丛书的史料价值、文学价值。需要说明的是,我只了解这套丛书的选目,并没有审读所收的全部回忆文字,因而不可能对这些回忆录的史料性和文学性一一作出具体评价,希望读者在阅读时能参照作家作品及其它相关资料,自行作出科学的判断。

2000年7月25日





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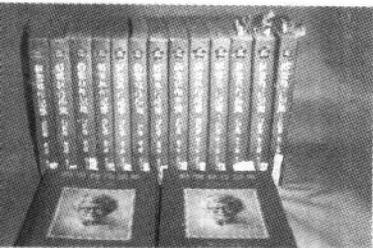
录

- 1 我的二姐苏雪林 苏晓林
- 7 九七翁笔下的九五女诗人 曾虚白
- 14 我最难忘的两位老师 朱雯
- 20 苏雪林在苏州 朱雯
- 27 苏雪林先生漫记 杨静远
- 34 记抗战中的苏雪林教授 孙耕
- 38 善秉仁的《提要》 施蛰存
- 40 隔海寄雪林 赵清阁
- 43 苏雪林女士来鸿 萧乾
- 47 我和苏雪林的一场笔墨官司 周楞伽 遗作 周允中 整理
- 52 苏雪林素描 沈晖
- 61 文坛人瑞苏雪林先生 丘秀芷
- 72 记苏雪林 陈纪滢
- 76 我所知道的苏雪林 谢冰莹
- 80 送雪林告别杏坛 谢冰莹





- 84 雪林师与我 苏淑年
- 90 她希望葬在母亲墓旁 陈淑渝
- 96 访百岁老作家苏雪林 舒乙
- 99 良师益友苏雪林先生 李曼瑰
- 102 一杯牛奶三份报纸与看《包青天》 林黛嫫
- 110 五十两黄金·一块破抹布 林海音
- 113 典范长存 王琰如
- 122 错爱 陈秀喜
- 124 向老友苏雪林教授致敬 陈致平
- 126 乐为应声虫 萧传文
- 129 寒梅著雪益精神 尉素秋
- 132 敬礼,不朽者! 林佩芬
- 138 童心永葆的苏雪林先生 叶蝉贞
- 142 不知寂寞的苏雪林 吴铃娇
- 147 可爱的苏先生 丘秀芷
- 150 苏先生,德不孤 丘秀芷
- 154 记苏雪林教授二三事 黄守诚
- 159 苏教授是一位很有个性的人 周昭翡
- 163 诚实不欺一信人 重提
- 166 惟有欢喜赞叹 刘静娟
- 170 高山仰止 朴月
- 173 一位最年轻的长者 赖丽娟
- 177 春晖山馆识春晖 颜淑婉
- 182 记苏雪林姑母 公孙熾
- 186 记雪林师二三事 谢一民
- 189 永远的梧桐 马森





- 192 经师人师话雪师 宋鼎宗
196 相识相知五十年 李绍昆
199 我的启蒙师 王家莹
203 恩师、经师、苏大师 龚声清
206 我所了解的苏先生 唐亦男
210 那“坐忘”的身影 唐亦男
216 遥祝居台我教文坛人瑞 董太和
223 苏教授的信仰生活 成世光
225 送别苏雪林教授 吴达芸
228 一封永远无法投递的信 唐亦男

附 录 一

- 232 致苏雪林 胡适
235 复苏雪林 胡适

附 录 二

- 237 太平圆梦 沈晖
245 苏雪林百岁终圆梦 张昌华
249 编后记 沈晖





苏晓林 我的二姐苏雪林

苏雪林女士是我的堂姊，我称她二姊，我们是同一个祖父。她在得享人间少有的高寿后，终于飘然而去。

二姊到底活了多大岁数？台湾的报导说她享年一百零四岁；而大陆的《杭州日报》登载了一位叫宫玺的投稿人撰写的文章说：她活了一百零二岁。后者的说法应较

正确，我手头有两封她给我的信可以作证。

在第一封信里她说：“我今年2月24日是活了九十八足岁。出生于清光绪二十三年，岁次乙酉，属鸡，是只大母鸡，合公元是1897。大家便要替我举行百龄庆典，花了好多钱，费了很大力，办了个庆祝大会。……”

在第二封信里她说：“我今年并未百岁。去年3月24日，成大和文化界照中国算法为我举行一个百岁庆典。今年外界传我为一〇一的人，那也由他去，其实我今年4月11日是九十九岁足龄。……”此信的日期是1996年5月20日，两信中所提的3月24日是阴历生日。

有人说萧伯纳比莎士比亚还伟大些，原因之一是萧活了九十四岁，而莎只享了可怜的五十二年，萧的执笔著作的时间比莎的整个生命都长，可不是吗？他写了五十多本剧本，而后者只有三十七本。

而苏雪林呢，她在二十九岁写《李商隐与女道士恋爱事迹考证》，九十七岁写最后一部《遁斋随笔》，共写了六十八年，出版了作品五十多部，在大学里教书也长达五十多年。这种情况，相信在古今中外都是少有的。

上面提到的1996年5月20日她的信，是她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从该信上，可以看出这位即将年满百岁的老人依然笔力劲道，思路流畅，条理清晰。信尾“雪林扶病上”字样，据她信中所述，当时之病是肾功能衰退和骨折，脑部尚未受影响，以后我接到她秘书来函说，从那时起，苏雪林就不能再握笔，身体真是不行了。无怪乎我没有再接到她的亲笔函件。

去年二姐回大陆旧地重游，那是在很多人扶持照料下才克成行的；我因人在美国，没有赶回去参加盛会。只听见前往拜见陪伴她的亲人说，她脑力和体力都已衰退，视觉和听觉也很差，

蘇雪林

苏雪林文集



对久别的亲人不但不认得，即使回忆起来，也无表情，只能木然对之。倒是回到幼时居住的故里时，显得十分激动。

多年以来，二姐就常向我说非常思念故乡——安徽太平县岭下苏村，现改名为黄山市黄山区岭下村。有一年她还要我回去帮她修葺故宅，以便她能回去居住。我劝阻她说乡下一切都还十分不便，而且，不但近亲已无，连同宗的远支也很少，过去那种全村都是一家人的温馨情况，已不复存在。且她又年老多病，回去以后如何生活？这样，才算打消了她的归意。不过她仍嘱咐，在她死后，要把她的骨灰安葬在故乡她母亲的墓旁。

《世界日报》1999年7月15日的上下古今版中有公孙嫵的《敬悼苏雪林表姑》的文章，她说：“苏家富有地亩千顷，在清朝挂有千顷牌。”这可能是传闻错误。我的这位伯父在前清虽曾当官，却清廉自守，没有多少余蓄。虽也置了一些田地，然为数恐怕不到千亩，伯父老后赋闲，即以此为生。过去农田收入不多，靠这田产只能将就着过。

记得我儿时有一次随母到他家做客，顺带吃了一餐饭，也是惟一的一次，那菜肴之粗糙，使我感到难以下咽。桌上最好的一碗菜，不过是炒鸡蛋，可能还是为我们加的菜，倒是伯父常到我们家吃饭。

二姐在有收入以后，即自动担负起贴补娘家的义务。她的长兄英年早逝，遗下寡妇孤儿多人。她的姐夫说是日本振武军事学校毕业，可是向来不务正业，置妻儿于不顾。苏雪林把姐姐接来和自己住，寄钱赡养扶助她的寡嫂和年幼侄甥，使他们都得到很好的教育。然而这种“贴娘家”的举动却引起她丈夫不满，成为他们夫妻不和的原因之一。事实上，在她丈夫去世后，苏雪林也曾无私地援助夫家的几个侄儿，并且收养其中之一为螟蛉子。

有一段时期，笔者就担负着为二姐转汇钱财给他们的任务。



其实他们的生活水平,以身处在大陆的标准来说并不算低。二姐只是怜悯他们相比较起来收入菲薄,而不断给予接济,直到她去世为止。但苏雪林的善心也并不是只为着自家人,她对她的几个贫穷而有志的青年学生,也照样慷慨地给予物质上的援助。

二姐经常接济大陆的亲人,有段时期据说曾引起台湾“国防部”的注意,派人去拜访她,劝她别再汇钱去了,说:“汇去他们也收不到。”(其实全部都收到。钱是由美国转汇过去的。)苏雪林教书的收入并不高,退休后的养老金更低;她的著作虽多,但都非畅销书,出版商也不愿承印她的作品,有些书还是自己花钱付印的,因而从版税上也谈不上有什么进帐。她所以有余钱接济人,全靠克勤克俭来的。见过她生活的人,对她的那种艰苦朴素都感到于心不忍,好在她一心只知读书著文,没有什么物质欲望,真能安贫乐道,称得上是今日的颜回。

不少人都知道在抗日战争爆发时,二姐曾将她的嫁奁,和多年来积蓄下来的教书薪俸一古脑都捐作抗战之用。苏雪林就是这样一位赤胆忠心的爱国者。她从小就忧国忧民,假若她生为男儿身,在那民族生死存亡之际,肯定投笔从戎了。读者诸君看过她的《寄华甥》那篇文章吗?那是骨肉之情和家国之情交织的最好表露。可以和诸葛亮的《出师表》、李密的《陈情表》并列。是一篇掷地有声、感人肺腑的杰作。

苏雪林并非是单纯的作家,她自己也不欢喜这个封号。她的第一部巨著《李商隐恋爱事迹考》属于文学探讨性作品,她花了三四十年时间所写的《屈原与九歌》更属于学术上的研究。所以她与同时代的冰心、丁玲和凌叔华等人是不相同的。

在从事这些学术工作时,她总是特立独行,不随流附众。她的一些立论有时难以被当代接受,但她不在乎,她说:“我将求知音于五十年,一百年以后;即五十百年以后仍无人赏识,那也不



妨。文章千古事，只需吾书尚存，终有拨云见日的时候。”（《浮生九四》序）

二姐工作时一点不苟且，为了解决屈赋中一些问题，她不顾阮囊羞涩，千里迢迢跑到法国去寻求资料。她一直猛烈地攻击鲁迅的某些观点，然而对《阿Q正传》却推崇备至。我曾问她这样是否违反她的私衷，她正色答道：“文艺批评应实事求是，不能以人废言。”她的这种公正、认真的精神是值得学习的。

虽然苏雪林学富五车，著作等身，但人却十分谦卑。大概是90年前后，她在台湾得到了大师奖，来信对我说，她感到十分惶恐和惭愧：“我怎么能和钱穆他们相比呢？他们才是真正的大师呀！”她感慨地说道。

有一次我对二姐说：“我觉得你的成就和才华已超过我们的先祖苏辙。”她连忙摇头说：“绝不要这样讲。辙公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是辉煌难比的。”她不准我以后这样提。

.....

现今大陆七十岁以上的人可能还记得苏雪林或苏梅这位文学家，因为在中学时代，从国文教科书上读过她的文章，也能从书店里买到她的著作。但在此年龄以下的人，大多数对她就懵然不知了。在1949年以后，她的名字、著作便完全销声匿迹。有位大陆颇具名气的作家对我说，他起初还以为苏雪林是外国人呢！

感谢二姐曾经任教过的安徽大学的教授沈晖先生，他在1989年编了一部《苏雪林选集》，1994年编了一部四巨册的《苏雪林文集》，苏雪林的名字才在大陆上又响起来。去年二姐回大陆探访时，武汉大学也向她发出请柬，但考虑到身体和时间限制，她遗憾地谢绝了。

还是先前提到的那位在文艺界颇有名气的人跟我说，他要



写一部有关苏雪林的电视剧。我说：“不可能的，你即使写好这部电视剧，它也没办法发行。”他不以为然，而且满怀信心地说：“你要知道，这些恩恩怨怨，在不久的将来全都会化为乌有。”但望他的话能很快变为现实！

顺便谈一下苏雪林的丈夫。

二姐幼时由祖父做主与张宝龄订婚，双方留学回来后完婚。张曾在当时中国一家最大的造船厂——上海江南造船厂工作。战前，这家工厂的一位美国工程师要离职整装返国，拍拍前来接班的张宝龄肩膀说：“年轻人，你要好好干，要知道你是第一个登上这个高位的中国人。”二姐夫经常穿着一条工装裤，或是一件蓝布长衫，理平头，又黑又瘦，寡言少语。实在看不出是上海圣约翰大学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又是中国的第一流造船专家；倒很容易被错认为刚到这十里洋场的乡巴佬。

中共建政后他留在大陆，颇得当局和工作单位的信任，仍居最高的地位，拿最优的待遇。他先在大连造船厂工作，韩战后到哈尔滨，改行设计矿山机械，退休后定居北京，并在那里逝世。他和苏家许多人都很好，就是和二姐合不来。两人结婚三十六年，住在一起不到四年，没有孩子，但谁都不愿意提离婚二字，张或许有些地方不大近人情，但“忠厚、老实”却可受之无愧。他还有语言天分，除了英文和俄文都好外，在我们老家做新姑爷不到一个月，就学会了一口道地的方言。他们夫妻之间一直用这种乡音交谈，二姐认为这倒是他们婚姻生活中一桩快事。

（原载美国《世界日报》1999年10月5日）